

· 战时上海 ·

SHANGHAI IN THE WORLD WAR II

二战中的上海

周 武 主编

 上海遠東出版社

战时上海丛书 Shanghai in the World War II

二战中的上海

主编 周 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战中的上海 / 周武主编; 周武等撰. --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5 (战时上海)

ISBN 978-7-5476-1037-4

I. ①二… II. ①周…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上海市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3057 号

二战中的上海

主编 周 武

撰稿 周 武 冯志阳 蒋 杰 成梦溪

赵光辉 张光润 陈来虎 蒋欣凯

责任编辑 / 匡志宏

装帧设计 / 张晶灵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 200235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订: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35.25 插页: 2 字数: 705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037-4 / K · 143

定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38

前言

中国的近代历史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以战争始，以战争终。战争带来的死亡、恐惧、仓皇、离乱，以及其他种种苦难艰辛和生存焦虑，是那个年代最深刻的共同记忆。上海则稍有不同，因为租界的存在，上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远离战火与动荡，于神州板荡中保持着一隅的繁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海不但未能幸免于难，而且首当其冲，惨遭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成为“二战中被摧毁的第一个世界大都会”（魏斐德语）。此后，华界和租界相继沦陷，这座亚洲头号的世界之都在日伪的高压统制下变成“步步荆棘的恐怖世界”。在这段史上最黑暗最艰辛的可怕岁月中，上海城市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开埠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强劲旺健的城市活力和发展态势，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更因缘际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商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集教育、出版、电影、广播、艺术、娱乐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中心，并跻身国际性大都市的行列，成为与伦敦、巴黎、纽约、柏林并驾齐驱的世界第六大城市，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据美国学者白鲁恂研究，抗战爆发前夕，商务印书馆一年的图书发行数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行总量，当年商务印书馆及上海出版业的图书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于此可见一斑。其实，不仅商务印书馆和出版业，上海的贸易、航运、金融、工商业、房地产、信息等行业也都步入各自的“黄金时代”。1934年5月，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查理·芮切教授曾根据当时上海一系列工农业、人口的动态数据预测：照此发展下去，十年后（即1944年），上海的重要性将超过伦敦、巴黎、柏林，从当时的世界第六大城市跃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

但是，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摧毁了上海

近百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扼杀了上海成为世界第二大都会的前景和可能性，上海的“黄金时代”因此被终结。

据国民政府中央统计局发表的数字，在“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直接损失高达 15.6 亿元，被难人数约 80 万人，约占华界总人口的 45%。战区内半数以上的工厂被毁，七成以上的商店遭到破坏，大中小学学校受灾 200 多所。地处交战区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即在事变中被毁。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治安已经恢复，日本陆军不久从上海全部撤退，一切也都恢复原状”。事实却是，闸北、吴淞、江湾等地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也未能“恢复原状”，而像东方图书馆这样的文化公益机构则永远地消失了。

与“一·二八”事变相比，侵华日军继“七七”事变之后发动的“八一三”事变，对上海的破坏更近乎毁灭性。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 4,998 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毁坏，战火最集中的闸北一带，工业损失 100%，虹口和杨浦损失 70%，南市稍轻亦达 30%。由于华界大片居民区被毁，上百万走投无路的难民像“森林中的生灵逃避天降大祸一般”从四面八方涌进仅 10 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茫茫人海中寻觅落脚之处，几乎每个角落都挤满了男女老幼，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睡在办公楼的走廊、商品贮藏室、庙宇、同乡会、娱乐场所、仓库，甚至棺材店。虽然上海各界在租界地区设立了众多的难民收容所，其中独臂神父饶家驹在毗邻法租界的南市区创办的“饶家驹安全区”即安置了近 30 万难民，使他们免于疾病和冻饿，但仍有大批难民无处栖身，露宿街头或废墟，病死、饿死、冻死者比比皆是，单 1937 年岁末处理的尸体即多达 101,000 具。事变中，闸北再遭灭顶之灾，被难情形最惨不忍睹。几乎所有商店、住宅、工厂均被摧毁殆尽，战前最繁盛的恒丰路、共和路、大统路悉成焦土，全区仅剩苏州河畔的几间残缺不全的住宅和一个裕通路的四安里（俗称三层楼）。¹另据统计，闸北华界地区全毁于“八一三”事变的里弄即达 295 条。²闸北曾是上海最具活力的都市工业区和“自治模范区”，被誉为中国迈向工业时代的一面旗帜，战后已变成满目疮痍、魍魉出没的一片荒郊野外。一位曾在那里安家的美国人说：“即使我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也没有被破坏得如此彻底的。”³

1 闸北区档案馆：18—2—8，参见张笑川：《近代上海闸北居民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5 页。

2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附录》，百家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89—298 页。

3 [美] 华百纳著、周书珪译：《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 页。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华界后，随即展开疯狂的经济掠夺，那些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华商工厂企业再度遭到洗劫。“其未被炮火所毁厂房，内存铁质器具，上自构造复杂之大机器，下至零件，甚至连虹口招商码头等堆栈地上铺的铁板，皆被敌人撬走了”¹。日军宣布对占领区内的工业物资进行“军管理”，总共76家中国企业被管制。短短几个月，日军通过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控制了上海绝大多数的煤、铁、盐、电、航运、铁路、烟草等军事及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质生产，并“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基础”²。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州河南岸租界虽已成“一座孤岛，一片为荒凉、恐怖和野蛮围困的绿洲”，但仍相对安全，华界工商业遂迅速向租界集中，大批难民的涌入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租界工商业不减反增，一度出现所谓“畸形繁荣”。据统计，1937年底，公共租界工厂仅442家，1938年底激增至4,707家，1939年又新增1,705家。³其他诸如进出口业、百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等也都大呈扩张之势，获利倍蓰。

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租界以后，上海全城沦陷，孤岛繁荣不再。日军“接管”在沪所有英、美商工厂71家，或以“敌性企业”勒令停业。1941年12月17日，又封闭各大仓库，禁止物资移动，并规定粮食、食油、汽车、五金、橡胶、化工原料、药品等均须限期登记。日军还“接收”了包括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煤气公司、英美烟厂等在内的所有大型企业，以及汇丰、麦加利、花旗等15家英、美银行。1942年3月27日，日军又对重要工业原料及其制品，以及大米、小麦、面粉、煤炭等实行军事统制。对华商工业企业，日军则以“经济提携”名义，分别以“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借”等方式加以霸占。更致命的是，由于日本和英美交战，海路断绝，上海的原料来源和工业产品销售立即陷入危机，并持续恶化，上海工业纷纷倒闭，全面萎缩。据王菊研究，1945年初上海华资纱厂绝大部分机器已处于停工状况。当年2月，30个纱厂中仅16个开工，运转中的纱锭只有65,318枚，布机721台，占总设备数中纱锭的5.9%和布机的8.1%。⁴华资纱厂的境况只是一个缩影，其他行业也大都难乎为继，日趋惨淡。

1 《申报》1938年2月15日。

2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3页。

3 刘惠吾主编：《上海近代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4 [法]王菊：《近代上海棉纺织业的最后辉煌（1945—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上海令人目眩的霓虹灯熄灭了，曾经灯红酒绿的摩登上海活生生地被日军拖入“黑暗世界”。有位外侨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这样感叹道：“上海这座曾经世界上最喧闹的都市，如今已变得寂静无声。”¹

二战时期的上海，蒙受损失的远不止华界和华人，据英国商务部长估计，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产业的物质损失达 50 万英镑，再加上其他间接损失，总损失当为此数的 15—20 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英美等国过去近一个世纪在上海所累积起来的财富和权势，全盘被日军以各种名义冻结或“劫收”。日军先后还关闭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危地马拉、希腊总领事馆及墨西哥公使馆，并软禁上述各国使领馆外交官，禁止使用无线电设备。向为英美势力操纵、垄断的工部局、海关税务司和警察局相继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清一色的日本人的独占机关”。与之相对应，先前公共租界在外滩所立的欧战和平纪念碑（1924 年落成）、巴夏礼铜像（1890 年立）和海关大楼前的赫德铜像（1913 年立）悉被日军拆毁，英美在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则被更名，如汇丰银行大楼被改为“兴亚大楼”，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改为“善邻大楼”，字林西报大楼改为“大同大楼”，有利银行大楼改为“共荣大楼”，美国总统轮船公司大楼改为“同文大楼”，等等²。更名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去欧美化，用当时日方的说法，就是“抹除英美色”；二是呼应所谓“东亚新秩序”。在这个权势大位移的过程中，“日本人在上海的势力和特权明显升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们现在甚至可以做许多别国人不敢做的事，而且完全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他们已取代英、美、法成为“上海最有特权的人”³。那种凌驾一切的权力和自由，即使是此前在上海的欧美人也未曾完全拥有过。就上海而言，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它意味着开埠以来欧美列强在上海建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导的“集团非正式帝国”秩序已被瓦解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炮制并由日本独霸的所谓“东亚新秩序”。由于上海是欧美列强在中国及整个远东地区的权势象征和利益枢纽，因此，这种变化影响所及，就不仅止于上海，也不仅限于中国，而是整个远东秩序。

华界沦陷后，日本就一直在觊觎租界，千方百计地向租界扩张自己的势力，与英美争夺租界的控制权和话语权，但租界仍控制英美手中。更令日本无法容忍的是，租界有如全国抵抗运动和抗战宣传的敌后总部，

1 [美] 华百纳著、周书荏译：《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第 117 页。

2 参见陶菊隐：《大上海的孤岛岁月》，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39 页。

3 [英] E.W. 彼得斯著，李开龙译：《英国巡捕眼中的上海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4、125 页。

国共组织的各种抗日力量依然活跃，各类反日报刊书籍照样出版发行。因此，日本掌握租界统治权后，立即查封所有反日报社、通讯社和电台，接管所有书店和出版社，并没收了书店内的所有反日书籍，同时派出“新闻传播车”在城里四处转悠，散发绘有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日本炮弹淫威下抱成一团的讽刺漫画传单。日本陆军新闻局还在重要道口竖起多块18英尺长、12英尺宽的“战况板”，“以让民众尽快了解真实战况”¹。为了配合日军的宣传攻势，汪伪势力则于1942年5月31日邀集上海各界“闻人”，在跑马厅举行“扑灭英美人侵略大会”，随后又成立所谓“反英美协会”（Anti-Anglo-American Association），一方面“鬼畜化”上海的英美势力，控诉并批判英美在租界推行的“恶政”；另一方面则以所谓“反英兴亚”为日本的侵略大唱颂歌。

宣传攻势尚在其次，更恐怖的是，日军占领租界后即开始在上海外侨中大肆搜捕盟国间谍之嫌疑者及对日本军队有特别危害之嫌疑者，许多英美籍新闻、金融、工商界著名人士因此罹祸，被关进日宪兵队的大桥监狱和江湾监狱，或被关押到海防路前美军陆战队营地。当时遭拘捕的外侨人数不少，单1942年11月5日日本人就逮捕了350名外国男性，其中包括243名英国人，65名美国人，20名荷兰人，以及数名希腊人、加拿大人和其他同盟国公民。被囚禁的侨民在狱中无不惨遭日军的非人虐待。曾被关押在大桥监狱的《远东》杂志主笔伍海德后来回忆道：“当我靠着墙边坐下时，有人告诉我这是不允许的。从早上6时到晚上9时，除了偶尔被允许散步一小会儿之外，犯人们只能面对木板排成几列，盘腿坐或跪着，不许出声。这里不允许阅读和任何精神或肉体上的消遣。要是有人靠在墙上或者伸伸腿，肯定要遭守卫一阵毒打……牢房里还在闹虱灾……天花板上的灯彻夜通明，晚上蚊虫叮咬、臭气熏天，想要睡个安稳觉根本不可能。”此外，他们还得承受各种各样的酷刑，“包括‘电疗’——将电线接在手脚上，把犯人电个半死；‘水疗’——用水桶往犯人鼻孔里灌水，直到肺几乎破裂；还有毒打和拔指甲”。²日军的暴行骇人听闻。

为了防止“敌国及敌性国”侨民加入反法西斯阵营，从1942年末开始，日军还先后在上海全市设立9座集中营（日军称之为“敌国人

1 参见〔美〕华百纳著、周书垚译：《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第111—112页。

2 Woodhead address at Chatham House, 21 November 1942, PRO, WO 208/378A, 转引自〔美〕华百纳著、周书垚译：《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第146—147页。

集团生活所”），对所谓“敌国及敌性国”一般侨民实行严厉的军事化管制。据粗略统计，先后有六千多名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苏联、葡萄牙、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侨民被关进不同的集中营。¹每座集中营四周围铁丝网，门口设岗亭，由日兵把守，被关押的侨民不得跨出大门半步，近乎与世隔绝，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

“敌国及敌性国”侨民之外，1943年2月18日，日军又以“上海地区陆海军最高司令官”名义颁布《限制无国籍难民居住营业公告》，将1937年以后来上海避难的德国（包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的所谓“无国籍犹太难民”强制集结到虹口、杨树浦接壤处的指定居住营业区，进行集中管理和“严格的监控”。这个“指定区域”，后来也被称为“虹口隔离区”或“隔都”。日本还一度考虑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提出的灭绝上海犹太人计划，后来由于欧洲战局逆转，日本怕开罪苏联，影响日苏之间的非战关系，才放弃该计划，转而实行隔离方式。7月初旬以后，集中区里的犹太难民被隔离，生杀予夺尽操诸日军之手，饱尝战争苦难、生活艰辛以及日军的凌辱。但由于上海犹太社团和上海市民的救援，隔离区的绝大部分犹太难民得以幸存下来。正因为如此，那些犹太难民始终把上海视作他们的拯救和再生之地。

当外侨中的嫌疑者被拘禁到监狱，“敌国及敌性国”侨民被押送到集中营，犹太难民被集结到隔离区之后，上海不受管制的非日本籍外国侨民就只剩下轴心国公民、俄罗斯人（白俄、红俄，还有俄国犹太人），以及一些亚洲人（印度人、菲律宾人等）。上海已被日本“除去敌性”，而被“除去敌性”的上海，实际上等于被抽掉了国际化的内核，仅存一副“国际都市”的虚幻外观。这是二战中的上海又一深刻的变化。

上海曾经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文化的中心，《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其他许多抗战文化经典均诞生在这里。但沦陷后的上海已无法再扮演这种中心的角色。日军开始实行严厉的宵禁令和军事管制法，“上海居民普遍受到严格控制。所有的商业机构，包括夜总会在内，都必须

1 关于集中营关押的外侨人数有不同说法：高纲博文认为，1943年4月，收容在集中营的“敌国人”人数为：英国人5418名、美国人1081名、荷兰人148名、比利时人47名、希腊人14名，总计6708名。见〔日〕高纲博文著、陈祖思译：《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华百纳则认为，1943年1月至7月间，大约有7600名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分批关押在上海8所集中营内。见〔美〕华百纳著、周书荻译：《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第149页。

晚上九点打烊。所有的道路都竖起铁丝网路障，由日本哨兵把守，检查过往人员的身份证件，强迫行人向他们鞠躬行礼。所有的英、美侨民都被迫戴上红色的袖章，以示其‘敌国侨民’的身份。日本人在前租界内还强制推行在其他中国人居住区已经实行的保甲制度。”¹ 市民外出必须携带市民证和防疫证，如果不带的话，就可能被当作抗日分子处置。上海实际上已被改造成某种形式的“集中营”²，完全丧失其原有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日军和伪政权更无所不用其极地采取了各种恐怖手段对付一切形式的抵抗运动和抗日宣传。坚持抗日宣传的媒体被取缔，大批的进步文化界人士被逮捕或胁迫，鲁迅夫人许广平、夏丏尊、章锡琛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先后遭到日本宪兵逮捕。一度十分活跃的城市抵抗运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和城郊，并陷入低潮。

然而，上海是一座不屈的城市，即使在这样艰难、危险的处境下，上海虽然也出现过“投敌者”，以及“为了单纯的生存欲望而忍受的种种妥协”，但更多的是不屈的抗争。华界沦陷之后，日本人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寻找所谓“合作者”，但他们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负责占领区民间事务的日本特务部只得去台湾招徕几个恶棍到上海市伪政府里充数，并从冒险家、秘密社会和犯罪团伙中发展势力。汪伪汉奸就曾企图说服郑振铎出任主持文化工作的伪职，并送上巨额支票加以收买，郑痛斥游说他的汉奸，将支票当面撕毁；现代出版巨擘张元济宁可卖房鬻书度日，也决不与敌伪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历史学家吕思勉凛然面对日伪利诱恐吓，并以“夜猫”、“六庸”等笔名发表《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文论，以明心迹；1942年夏，日本宪兵先后数次逮捕中华职业教育社留沪负责人姚惠泉，企图破坏抗日地下组织及文化界人士的抗日活动，姚惠泉受尽折磨，却始终不屈；抗战时期辗转沪港两地的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蓄须明志，靠卖画甚至质典度日，汉奸褚民谊亲至梅宅相逼，梅兰芳不惜自损身体，也坚决不为日伪当局演出；日伪当局逼迫圆瑛法师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遭拒绝后，日军对圆瑛法师毒打利诱，法师专心打坐念佛，使日军毫无办法；1945年4月19日李健吾被捕，在狱中被折磨成“一个哀求着死亡的肉体”，但始终“拒绝说出任何名字”。类似的事例，在当年的上海可谓

1 [法]白吉尔著，王菊、赵念国译：《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2 在1941年12月底日本驻沪陆军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一名美国通讯记者尖锐地提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会不会被投入集中营，日本陆军发言人就曾公开回应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租界本身就是一个集中营。”参见[美]华百纳著、周书荻译：《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第112页。

不胜枚举。这说明上海虽沦陷，但道德正气无所不在。这是与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抗战，一种不屈服于厄运的坚忍抵抗，这种抗争一直坚持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战中的上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场域。自开埠以来，上海一市三制，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从未停止过。“一·二八”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随着上海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国际关系格局的剧烈变迁，上海又形成许多新的尖锐矛盾。据魏斐德的研究，这些新的矛盾主要有六对，包括西方列强（英、美、法）与日本的矛盾，西方列强与中国关于治外法权的矛盾，西方侨民与在沪日侨的矛盾，日本军队与中国游击队的矛盾，上海本地犯罪组织与来自朝鲜和台湾地区犯罪组织的矛盾，分别忠于重庆和汪政权的特工之间的矛盾。此外，至少还有轴心国内部的尔虞我诈。这些新的矛盾，再加上既有的矛盾，彼此交织，诡谲多变，使上海的这段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有经济角力，有观念与权益之争，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明争，有暗战，有不屈，也有阴谋与背叛，可以说二战中的上海展开的就是一场全球仅见的微型世界大战。

本书分上中下三篇讲述二战中的上海，就是希望从更深广的角度认识和理解这种复杂性，以及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在二战中的特殊命运。

目 录

前言 ...iv

上篇 ...1

第一章 淞沪抗战 ...3

- 一、“一·二八”抗战 ...3
- 二、“八一三”淞沪会战 ...19
- 三、战火中的城市与民众 ...35

第二章 孤岛岁月 ...55

- 一、乌云遮蔽下的上海城 ...56
- 二、过山车上的上海经济 ...69
- 三、非常时期的日常生活 ...83

第三章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 ...104

- 一、日本为何要占领公共租界 ...104
- 二、“大东亚上海”：日本占领下的“敌性国”及其侨民 ...118
- 三、“大东亚共荣圈”下的日伪政权及其上海代理人 ...132
- 四、租界：在“交还”的背面 ...137
- 五、日伪统制下的社会相 ...143
- 六、日伪势力的穷途末路 ...153

中篇 ...157

第四章 大内迁 ...159

- 一、国民政府、民族资本家与工厂内迁 ...159
- 二、国立与私立之间：抗战时期的上海高校内迁 ...177

第五章 城市抵抗运动 ...198

- 一、洋旗报：孤岛上的文化抗战 ...199
- 二、韧性抵抗：中共与上海沦陷后民众的“日常反日斗争” ...220

第六章 战时上海的难民危机与救援 ...237

- 一、难民的数量及其变化 ...239
- 二、难民的流动：输入与输出 ...247
- 三、难民营的设立与运行 ...253
- 四、避难与危机：死亡、疾病与饥饿 ...266
- 五、结语 ...272

第七章 锄奸记：战时上海的政治谋杀与恐怖主义 ...274

- 一、恐怖主义的传统：“南京十年”的命案与政治谋杀 ...275
- 二、战时恐怖主义的起源 ...280
- 三、针对政治人物的谋杀案件 ...284
- 四、通敌者的恐怖活动 ...288
- 五、政治谋杀的高潮 ...292
- 六、命案与政治谋杀的数量变迁 ...296
- 七、死者的身份与命案的属性 ...303
- 八、结语 ...305

第八章 战时上海出版业 ...307

- 一、书业黄金时代的终结 ...307
- 二、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业 ...312
- 三、沦陷时期的上海出版业 ...329
- 四、商务的命运：战时上海出版业的缩影 ...339

下篇 ...353

第九章 胜利庆典 ...355

- 一、“天亮”前后：民间自发的欢庆狂潮 ...357
- 二、倾城狂欢：胜利庆典的筹备、举办与余波 ...377
- 三、胜利以后：历史的另一种选择 ...406

第十章 上海审判 ...414

- 一、战后审判的缘起 ...414
- 二、国民政府所属上海军事法庭对日审判 ...418
- 三、在华美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441

第十一章 大遣返 ...449

- 一、遣返准备 ...449
- 二、日俘日侨集中区 ...456
- 三、日俘日侨的管理及各种政策 ...463
- 四、日俘日侨的教育 ...474
- 五、日俘日侨的遣返 ...486
- 六、其他敌性国及有关地区的遣返 ...488
- 七、结语 ...492

第十二章 战后日本对华赔偿 ...494

- 一、日本赔偿的方案及实施 ...494
- 二、上海所见的日本赔偿军舰的接收 ...497
- 三、上海所见的日本赔偿物资接收 ...523
- 四、结语 ...547

后记 ...549

上 篇

SHANGHAI
IN THE
WORLD WAR II

第一章 淞沪抗战

1930年代，上海及其近郊地区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战火洗礼。从“一·二八”淞沪抗战到“八一三”淞沪会战，从十九路军的奋起反抗到国军精锐的主动出击，抗日战争的进程也随着沪上的枪林弹雨从局部走向全面。现代化战争留给这座繁华都市及其民众的不仅是巨大的破坏、死亡、苦难和种种恐怖而惨痛的记忆，还有中国军民面对强敌的同仇敌忾和坚韧不屈的勇气和精神。

一、“一·二八”抗战

1932年的上海从新年一开始就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九一八”事变所引发的民族危机继续在北方发酵，东北军的残余部队还在白山黑水之间誓死抵抗日军的围攻。而此时的上海，民间的抗日浪潮正此起彼伏。无论是学生、工人、小业主、教授还是资本家，纷纷投入到这场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去。上海的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采取罢课、募捐、组织救护队援助抗日将士等形式，并组织了三次赴京请愿活动；文化界成立反帝抗日联盟，疾呼“集我义师，执戈前驱，复我国土，慰我国民”¹；上海总商会宣言对日实施经济绝交，通告各个行业严密检查日货；日商纱厂的工人成立抗日救国会，有的日厂华工干脆全员退职。自“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1年12月31日，上海各界团体共发出了532件抗日通电或者宣言，举行集会138次。²

1 《教育界救国会电请出兵》，《申报》1931年9月26日。

2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157页。